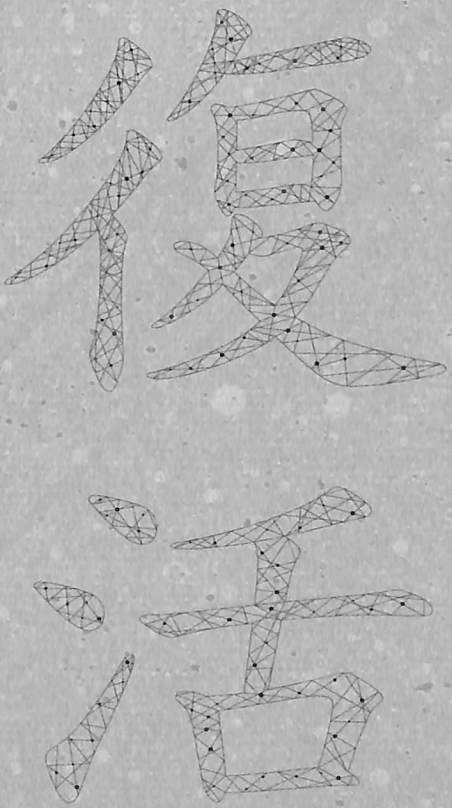
# 第一部分




©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Omnia Omnibus

# 大地之法的終末處：

## 陶貝斯與施密特之間

陳錦輝

All Rights Reserved

©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可以肯定，卡爾·施密特，此刻你的教導不會徒勞（non jam frustra doces），即或他遭遇挫折，誤入歧途……也許我們還有機會一起討論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政治神學，無論站在猶太教抑或基督教而言：《羅馬書》九至十一章。這裡也出現了「敵人」一詞，並且在絕對的意義上——然而，在我看來至為關鍵和有望的，是這個詞與「蒙愛」相連。

陶貝斯寄予施密特的信，1979 年 9 月 18 日

後來晚了，太晚了，非常晚……

陶貝斯回憶 1979 年 9 月末，接到施密特來電，
終於決定前往普勒滕貝格，第一次與施密特見面：
〈施密特：反革命的天啟先知〉

## 一、太晚了

一般認為，近三十年哲學思潮對聖保羅的關注，始於陶貝斯（Jacob Taubes, 1923-1987）在 1987 年 2 月 23 至 27 日四堂海德堡的講課。這系列講課於新教學院跨科際研究所（Protestant Institute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EST）舉行，主題是《羅馬書》和保羅的政治神學。其時陶貝斯已身患惡疾，亦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但他仍接受邀請，往赴海德堡，每天講課三小時。講座橫跨星期一至五。除了星期四，這天正好是他的生日，而他整日都待在醫院治療和休養。講課完結不足一個月，陶貝斯於 3 月 21 日逝世。聞說他講課時


©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手上並無講稿，如今我們讀到的是當日錄音的整理。[1]

面對個人生命的最後期限，陶貝斯似乎認為自己必須完成這次講課。從此看來，陶貝斯是否某個哲學熱潮的起始，大概也不是那麼重要了。關鍵不是始源，反而是終末。這甚至不是生命時間的終末（the end of time），而是終末時間的生命（the time of end）：在面臨終末的時刻，一個無論做甚麼似乎都「太晚」的時刻，一個將死之人會念及甚麼？又選擇去做甚麼？我如何面對將要過去的全部人生？要明白過去，我們需要歷史的介入。然而，假若歷史不單純等同於過去，甚麼才是歷史？是甚麼構成歷史的事件？陶貝斯早於二十四歲已經明白，要徹底思考歷史，來自終末的靈（光）必不可缺。正如他自己說：「從終末的視野去置放歷史本質的問題時，我們便具有立場和準繩。正正在終末裡，歷史超越了自身的限制，如其所是展現人前。」[2]我們亦必須這樣去理解陶貝斯在 1987 年 2 月往海德堡講學的決定。

講課甫一開始，陶貝斯已經指出，他對保羅的關注，源自他和一個巨人長達三十年的戰爭，而後者當然是指上世紀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憲法及國際法學者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施密特並不是普通一個私敵（*inimicus*）；作為猶太人，陶貝斯必然視曾經效力納粹的施密特為公敵（*hostis*）。就算施密特在 1936 年因言論觸犯黨

1 Jacob Taubes,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Paul*, ed. Aleida Assmann et al., trans. Dana Hollan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譯本見陶伯斯（Taubes）：《保羅政治神學》，吳增定等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2 Jacob Taubes, *Occidental Eschatology*, trans. David Ratmok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衛隊而被官方報章《黑色軍團》（*Das Schwarze Korps*）狠批，在戈林（Hermann Göring）保護下才保住了人身安全和學術職位，這亦沒有改變他在外界眼中的爭議性。陶貝斯明言，他們彼此對對方而言，都是絕對的敵人；這個事實無法逆轉，在此世亦沒有天真地復和的可能。人人都知道，庸俗的仇人總是常見的，可以單純憎恨和厭惡的眼中釘，人人生活周遭總有一兩個，並不出奇；但說到絕對的敵人，可以互相肯認對方為永遠的對手，並堅持相鬥至死，卻是十分罕見，甚至難得：「我們知道，我們到死都是對手，但我們相處極為融洽。我們知道這一點：我們在同一個平面說話。這是相當罕見的事情。」[3] 陶貝斯和施密特這場巨人之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真理：相比起朋友，我們從敵人身上可能學到更多對生命重要的事物。

陶貝斯年少聰慧，二十歲已經按立為拉比，二十四歲以「歐洲終末論」為題寫成博士論文（*Abendländische Eschatologie*）。這本論文後來經德國出版社斬去大量篇幅（約二百頁），並且在欠缺嚴謹編輯和審校的情況下出版（陶貝斯亦沒有機會在出版前審閱一次）；此書斷版四十年後，1991 年再次於沒有任何修正的情況下重印：誤字、誤印、遺漏的註釋、不完整的文獻書目。[4] 而這樣一本不完整的早期研究，其實已經是陶貝斯唯一出版過的單一著作。陶貝斯一生人發表過六十九篇論文，篇幅都不大，當中只有二十二篇彙輯成《從宗教

3 Taubes,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Paul*, 69.

4 David Ratmoko, preface to *Occidental Eschatology*, by Jacob Taub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xi.



©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膜拜到文化：朝向歷史理性批判的一些斷片》一書。[5] 除卻以上，我們可以讀到的就只有從四場海德堡講論錄音編集而成、身後出版的《保羅的政治神學》。對於許多英語讀者而言，他們首先接觸的陶貝斯作品，就是最後這本《保羅的政治神學》。[6] 關於陶貝斯生平資料，同樣十分有限，我們手上甚至沒有一本關於他生平和學術生涯的完整傳記（傳聞即將出版）；而我們現在所知的，要不來自他有限的自述，要不來自他學生口耳相傳的故事。所有上過陶貝斯課堂的學生都同意，他是一位充滿魅力的老師，傳聞上世紀許多歐陸哲學家及宗教研究者，以至一大批從歐洲移居美國的學者、猶太學人、政治及文化評論人，都受其講課啟發。儘管如此，與號稱威瑪共和時代的首席法學家施密特相比，無論從著作量、權力和影響力來看，陶貝斯似乎都不值一提。究竟是甚麼促成兩人的三十年戰爭？又是甚麼引發陶貝斯去揭示埋藏於《羅馬書》的政治神學？[7]

5 Jacob Taubes, *From Cult to Culture: Fragments Toward a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 ed. Charlotte Elisheva Fonrobert and Amir Eng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大概亦多得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對陶貝斯極力推崇，才令許多英美學者重新發現陶貝斯對當代哲學、宗教研究和思想史的重要性。

7 本文並不旨在綜合陶貝斯四日講座的內容，因其講座涵蓋的內容幅度實在太寬廣，可以說是一個以保羅政治神學為宗軸的歐洲思想史，根本無法在本文有限的空間裡得到系統和妥善的整理。原書的德語編者值得讀者稱許，他們在陶貝斯講辭後附上的後記，是一個完備和清晰的撮要和補充，這個後記在英譯本和中譯本都有翻譯出來。本文作者絕不可能做得更好，亦無謂重複。我們將要注目的是陶貝斯和施密特的部分論戰，而保羅的政治神學將會是兩人之間的一道界限，既分離、亦連合著兩個敵人。

©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 二、膜拜技術的時代

陶貝斯的父親是位薄有名氣的拉比，由於其父需要前往蘇黎世赴任首席拉比之職，陶貝斯舉家於 1937 年遷居該地，這才得以躲過納粹屠猶的浩劫。陶貝斯畢生的哲學及宗教思考都以「天啟」和「終末論」為標記，彷彿與作為民族餘留者的苦難經驗相互呼應。天啟與終末，自然滿有宗教或至少神學味道。或者，這些思想的標記都與陶貝斯的民族及家庭背景多少有點關連；然而，亦肯定不止於此。陶貝斯的「天啟－終末」思想背後，必然有遠超其個人背景的重要事物，催逼他奉獻生命於其中。只要讀過他的博士論文《歐洲終末論》即可知道，對陶貝斯而言，終末的時間意識，其實早就隨從猶太及基督宗教走進歐洲，二千多年來孕育了豐饒的歷史、哲思、政治以至革命之海。從此看來，與天啟和終末學說相關的一切宗教思想、信仰和隱喻，並不如字面般只消極地指向某個神幻不可知的末日異境，或只停留在隱秘的私人信仰領域，而是具有強大的政治潛能和文化構造力。

不過，隨著歐洲步入廣義下的現代，我們亦看到另一條歷史軌跡，是如何逐漸結晶成一場關於社會、知識和精神面貌的巨變，人在其中嘗試顛倒和克服一切來自猶太一神論及彌賽亞主義的信仰遺產。許多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將這個脫離神而自立的過程命名為「世俗化」(secularization)。脫離神學和宗教，進入自然科學和人文理性，這個轉向漸漸被視為現代的本質。可以說，無論陶貝斯和施密特在政治神學上的見解如何分歧，他們對於這個將神聖化成世俗的過程，


©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是有相近的取向的。我們值得花點時間在這個問題上，以此作為探討陶貝斯與施密特之爭的一個起點。

施密特指出，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歐洲走的是一條「中性化」（neutralizations）的道路。1929 年，施密特在巴塞隆那一個會議內發表了一場饒有意義的講論，題目是〈中性化與去政治化的時代〉。[8] 我們可以從清晰的講題得知第一個關鍵：「中性化」和「去政治化」是互為作用的，甚至是同一現象的兩面。稍加思考，我們必然為此感到詫異。將遠離神學玄想和宗教偏執的過程說成「中性化」（或「中立化」）尚可以理解，但為甚麼是「去政治化」呢？這裡也沒有甚麼神秘的道理，施密特的意思非常直接：因為十六世紀的神學時代才是充滿爭議和論戰的，相比起後來取而代之的理性主義、實證科學和科技社會，神學裡頭有至為政治的事物。甚至可以說，神學其實是危險且見血的。There had been blood。遠離神學、根除神學的欲望，迎向的是一個妄想永久和平，卻無政治可言的偽善時代。

這條脫離神學的中性化之路，並不是單一同質的，而是在幾個世紀之間以多重疊進的過程衍生出來的。施密特提出了一個「中央域」（central domain）的說法來描述和解釋這個進程。任何人只要在某時某地存活，其思考、實踐和經驗均必然圍繞著某個知性領域來建構。譬如說，1755 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引發了大量人文道德的思辨；

8 Carl Schmitt, "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 i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 George Schwab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80-96.

©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然而，如果同一場地震在今天出現，對當代人的道德心靈還會如此震撼嗎？當然不，因為我們早已習慣了甚麼地殼板塊理論的解釋，也有地理學和地質學的專家為我們提供技術性的數據、資訊和見解，任何將地震和道德生活掛勾的思考，若非反智，亦只能是客觀科學以外的空談。同是地震，為甚麼我們有如此不同的回應？施密特說，因為我們賴以生存的中央域已經轉移了，我們不再從人文道德去論說自然災變的問題，而是從科學技術的視野來觀看。中央域於人類生活而言，可類比於「範式」（孔恩〔Thomas Kuhn〕語）在科學知識革新過程所扮演的角色。範式一經轉移，本來的科學知識世界便會斷裂，新的範式會將已有的知識重新結構化；同樣，中央域的轉變亦可以全盤改寫我們的生存經驗。

由十七世紀到當世，施密特看到四次中央域的移位：先是從神學轉向形而上學（笛卡兒、霍布斯、斯賓諾莎、萊布尼茲、牛頓……），然後從形而上學轉向人文道德（啟蒙思想、盧梭、康德的批判哲學……），再從人文道德轉向經濟（馬克思主義）；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則由經濟轉向科技。有趣的是，如果說先前每個中央域裡都有不少精英和精神領袖（施密特稱呼這些時代的領航人為 *clerc*）去帶動該知識域的崛起、變革和更新，施密特眼前這個科技時代則不再需要任何風流人物。技術型思考強調機械化的操作，是中性的，傾向將曖昧不明的因素、個人經驗、歷史的偶發和歧義一一移除；它追求程序的理性和持之有效的法規，拒絕危險的決斷時刻。如此一個技術年代卻不必然是了無生趣的，事實亦可以正好相反；正如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對各種嶄新技術、


©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工程、產品和設計的狂迷和熱情，與二十世紀上半葉施密特的同代人相比，可說是有增無減。當世對技術可謂近乎膜拜。施密特一語中的：魔幻的宗教光暈，早已變成同樣魔幻的技術神話，無時無刻覆蓋著我們的生命。[9] 這是個由實證、科技、程序與專家所結合而成的新宗教。

施密特的時代診斷不為甚麼，只為思考眼下法政權的問題和危機。所有現代法政權（state；即所謂「國家」）在現實的效能和權力均取決於當其時的中央域，因為所有法政權牽涉的政治決斷都和這些中央域密切連繫。在不同中央域的影響下，法政權分別要定奪人民的宗教、民族和經濟形態，而這些決斷絕對有可能導致爭端甚至生死相搏的戰爭，例如天主教和新教的對抗，或者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抗。而施密特從將近五百年的中央域轉移過程裡，銳利地觀察出一個意義深長的規律：歐洲人總是嘗試從某個衝突域逃向另一個中性域，及後當該個中性域衍生和累積起衝突時，他／她們又重施固技，尋求另一個可能的中性域，這個過程一直重複，直至科技域的出現，似乎保證了和平、幸福和大同的願景。換句話說，歐洲一直欲求一個政治衝突零度的「純粹」域。[10] 施密特卻是非常清醒——起碼我們可以說，經過德國在一戰的挫敗、時刻面對著敵國的嚴苛懲處和壓制，施密特與他自己所敬仰的霍布斯（Hobbes）一樣，

9 Schmitt, "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 85.

10 無論是陶貝斯還是施密特，都對這種「純粹」持有極為批判的立場。用陶貝斯的說法，所謂純粹，包括康德的啟蒙巨著《純粹理性批判》內的「純粹」，總是脫離經驗、語言和歷史的。參 Jacob Taubes, *To Carl Schmitt: Letters and Reflections*, trans. Keith Trib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41。

©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一切——聖保羅與當代思潮
**Omnia Omnibus: Paul, Our Comrade of Time**

主編：陳錦輝
執行編輯：郭清容
封面及排版設計：陳盼 (Pan)

出版及發行：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橫窩仔街 2-8 號
永桂第三工業大廈 2 樓 B 室
電話：(852) 2407 4000
傳真：(852) 2407 4111
網址：www.vwlink.net

版次：2016 年 10 月初版 香港
ISBN：978-988-14207-7-0
cat no.: vwla-007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 2016

©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當代歐陸哲學的「保羅復歸」熱潮，是一場牽涉議題極為廣泛、參與者為數眾多的「哲學界的保羅新觀」。
保羅的思想本質上即是一種革命性的思想，以及這種革命性思想在歷史上的實踐。

曾慶豹｜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書將要恍如一顆沉默的核彈般，靜靜地震撼、催促、改變華人神學發展的一切，它讓我們不能不面向直視一個早已存在的新時代光景。
誰只顧戀昔日的保羅，誰就失去保羅的全部。

陳韋安｜建道神學院神學系助理教授

當今資本主義世界，每天都花不少氣力和時間預測各種走勢；保羅本人恰好就是資本主義世界追求的可預測性的對立面。而本書則為讀者詳盡剖析保羅對當代哲學的吸引。

馬國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兼任副教授

這是不可多得的好書，所有關心世界的人，關心現代人生命的人，都不應錯過。
保羅的確是我們的同代人，就只差我們有沒有能力去把他認出來。

李達寧｜序言書室創辦人

ISBN 978-988-14207-7-0
cat no. vwlk007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2016 德慧文化圖書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